

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分析及启示

刘东建

内容提要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传播、维持和改变。一国政治文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相互作用与耦合,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变量。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韩国社会经历过多次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规范的解体、分化与重组。韩国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受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巨大。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三国对韩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分析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与现实,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韩国政治 社会变迁 政治文化 政治社会化 政治现代化

作者简介 刘东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学研究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¹ 政治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不是靠自身实现的,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只有通过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才能得以维持、传播、继承和发展、改造”。^④ 本内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国家与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④ “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到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1/4} 如果说政治文化是实现这个“共同体”的基础与内容,那么政治社会化可以说就是构建这个“共同体”的过程。“一个合法性信仰对于维持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对于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政治系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2}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

的相互作用与变迁,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教育的普及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韩国社会经历过多次传统社会的

¹ 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41页。

^④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42~243页。

^④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al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1/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147页。

^{1/2} [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338页。

价值观和生活规范的解体、分化与重组, 韩国政治文化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 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 现存政治结构也规约与建构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或者考察政治行为或政治现象时, 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能够帮助了解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渊源及其现代流变, 从而使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的特点和基本状况。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韩国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 尤其是受中国、日本、美国的影响巨大。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三国对韩国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这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社会化, 进而理解政治社会化在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乃至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 如何实现平稳、快速发展, 其间政治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的意义何在等,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儒家文化的社会化及其影响

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历史传承性, 任何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约着该文化后期的发展, 一如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所提到的轴心时代¹对一地区的影响: “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 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的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的潜力的回忆或复兴, 提供了无穷的动力。”^④而当这种政治文化形成以后, 它又会以自己特有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去。即便是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甚至有根本性的变革, 旧的政治文化还会以各种面貌表现出来而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比如, 儒家文化进入韩国之前, 朝鲜半岛崇尚起源于我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 该教至今仍是韩国人的基础宗教, 部分人仍保留着萨满教的信仰。自朝鲜三国时代^④起, 儒家文化传入朝鲜半岛, 其对韩国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中国的儒学正式为韩国人接受并融入自己的生活大致始于韩国的三国时代。据《三国史记·高丽本纪》记载, 在小兽林王(第17代王)二年(公元327年), 就已“立太学, 教育子弟”。所谓太学, 是完全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国立大学, 教授内容则是用汉字书写的儒家典籍, 受教育者限于贵族子弟。其后的百济、新罗也都仿此, 以儒家经典开科取士。此外, 在三国时代, 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向唐朝派遣大批留学生学习儒学, 各自设立了国学, 从而使韩国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对于孔庙历史记载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国家。百济在公元4世纪就接受了儒学, 高丽王朝于公元10世纪实行科考, 并开设了国子监, 招收贵族子弟, 进行儒学教育。公元1392年, 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王朝, 崇尚儒学, 将儒教定为国教, 命令全国各地的城乡都建立起从事儒学教育的乡校, 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支配了整个社会。如果说李朝建立之前,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还曾有过文化多元的因子, 那么李朝之后, 儒家文化可以说就是一元独尊, 完成了在韩国的社会化的过程, 乃至完成了儒家政治文化制度化的过程。“李朝太祖李成桂在公元1392年篡权而建立起李氏朝廷之后, 吸取了高丽王朝的教训, 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 极力防止分权和地方势力上

¹ 所谓轴心时代, 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周朝末期至先秦时期, 那时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文明几乎是同时得到极大的繁荣, 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精神成果。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 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

^④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历史的起源和目标》, 魏楚雄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14页。

^④ 朝鲜半岛的三国及三国时代是指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 在半岛上存在的三个割据政权, 分别为高句丽、新罗、百济。公元668年, 新罗在唐朝帮助下征服百济后灭高句丽, 结束三国时代, 进入统一新罗时代。

升的趋向。他加冕的第三天，司宪府提出了李朝新政权的十条原则；两个月后又颁布了二十条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可以归纳为紧密联系的两点：一是尊儒排佛；二是加强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统制。从太祖采取这些措施到世宗（1418~1450）设立‘集贤殿’，指定著名儒生研究中国明朝的政治法律制度，编纂出六卷《正典》再到成宗（1469~1494）登基的第二年推出《经国大典》，是朝鲜政治制度‘儒家化’的过程，也即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形成的过程。不到100年时间，朝鲜成了‘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¹

从此，儒教成了决定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体制性质的基本价值体系。因此，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指的就是儒家文化。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社会化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实现的，在教育方面，如“新罗的国学设置博士和助教来教授儒学，将儒学分为三个科目讲授：‘《五论语》《孝经》《礼法》《周易》’^④《论语》《孝经》《左传》《毛诗》^{④④}《论语》《孝经》《尚书》《文选》《论语》和《孝经》是三科共同的必修学，五经和文选则是选修科，学员主要是贵族子弟”。^④此外，韩国古代的乡校，其实就是王朝设立的专门从事儒学教育的地方官校。

在选拔人才方面，朝鲜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大臣。科举考试是成为两班文武的必由之路。国家通过教育机构培养具有儒学涵养的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服务的官僚，并借科举制度为媒介选拔维护集权化统治的有用之才。所以，儒学教育是前提，科举是措施，维持集权统治是目的，最终促成了儒学的社会化。

儒学在韩国的社会化，还体现在其对韩国政治治理方式的选择上。一般认为维持现存政治体制的手段不外乎“高筑墙，广积粮”，即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古代，韩国都认为武力和经济力一旦过度，就会破坏‘仁’，即武力是破坏人性的原始原因。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力求回避武力冲突，尽可能以和平方式来维持国体。

经济力只是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手段，超过维持生活这个范围，也会破坏人性。认为贫穷意味着伦理道德上的清白，从而在治理国家的手段上，推崇‘文治’而轻视武和商。在李氏朝鲜时代，文官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就是这种价值倾向在社会结构上的反映”。“治理国家就是要读书修身，按礼治或德治行事。这种崇文、崇士而轻武、轻法的文治主义，到李朝中叶，随着朱子理学的传入而升华为理气哲学，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④④}这都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因此，“儒学传入朝鲜并成为唯我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维护了集权官僚制的等级社会秩序，使统治的生活方式庄严化，社会达到一种新的‘和谐’，也就是前面论述的集权官僚制政治秩序和经济控制”。^④

儒家文化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终于在韩国历史上完成了其社会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化”、“民间化”。在韩国传统社会，儒家文化服务于集权官僚利益，是集权官僚结构的黏合剂，韩国社会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一直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体系。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儒家伦理完成了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系，并通过培植文官阶层和新兴小土地贵族，削弱了大土地贵族和僧侣集团。儒家文化在韩国社会化的过程中，还培育了传统社会士人的精神气节。无论是朝鲜中期（16世纪）形成的“忠不只限于忠君，扩大成为直接关系爱国、爱民的思考，进而升华为所谓的士大夫精神”，还是朝鲜中期以后，“许多清白官吏与处士、气概如竹的志士和面临侵略奉献自身的学士、烈士及义士之不断出现，原因不在别处，就是在朱子学的风气中被称为春秋节义精神的政治、伦理及历史意识复合的结晶中产

¹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 第6~7页。

^④ 赵炜：《韩国现代政治论》，东方出版社，1995 第120页。

^{④④} 赵炜：《韩国现代政治论》，第122页。

^④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道路》，第19页。

生的”。¹ 近代以来的“日韩合邦”、“美军占领”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儒家文化所营造的政治体系，但儒家文化对韩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仍不可小觑，直至今天，韩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族文化、地域主义、家长制、威权主义等，都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历史的根源，可以说儒家文化已经渗透、蔓延于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 日本文化的强行植入及其影响

日本文化对韩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谓极其重大。1875年（高宗十二年），日本出动军舰强行打开朝鲜大门，摧毁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开始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日本文化在韩的社会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不仅继续驻兵朝鲜，同时进一步要求朝鲜实施内战改革。遭到拒绝后，日本便采取武力，强行驱除闵氏权力，恢复大院君的权力，组织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新政府，推行全面改革，史称“甲午更张”。“甲午更张”对韩国政治文化影响深远，它所倡导的改革深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尽管它是渗透着日本的野心、在日本主导下的非自主改革，但客观上却为半岛之后的近代化铺平了道路。其后，日本通过《韩日议定书》《韩日协定书》《乙巳条约（韩日协商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完全控制了韩国。1910年8月29日，日韩正式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日韩合并。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韩国始得光复。从《江华岛条约》的签订至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投降，日本对韩国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文化制度、教育制度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造。所以，至今韩国政治文化还保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具有更多的政治目的，而不仅仅是经济掠夺。“在日韩合并之前，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是彻底的殖民地政策，把它仅仅当作一块殖民飞地，同其他殖民者一样进行不负责任的资源

掠夺和商业渗透。1910年合并之后，日本把朝鲜当作‘新领土’对待，不再只把它看做‘殖民地’，采取了‘整合’的政策，企图把朝鲜从政治上、经济上整合进日本帝国。”^④ 日本除了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之外，还企图消灭整个朝鲜民族，使韩国人“日本化”，并从人种、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寻找“根据”论证日韩两国同宗同源，欺骗朝鲜百姓，打出所谓“皇国臣民化”、“内鲜一体化”、“一视同仁”、“共存共荣”等口号，将朝鲜文化溶解乃至消弭在日本文化中。著名的“甲午更张”实质上就是把日本的明治模式搬到朝鲜。

日韩合并时期的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的。1911年8月，日本方面针对殖民地的教育方针和制度颁布了《朝鲜教育令》，该教育令规定，对韩国人的教育方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养成忠良之国民”，二是“教育以适应时势与民度为期”。如1938年制定的《小学规程》第一条就规定：小学注重儿童身体的健全发育，涵养国民道德、传授国民生活必需的普通知识，着力培养忠良的皇国臣民。各门功课都要求把日本精神渗透进去。课程的教学，甚至教学科目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审定和教科书的编纂都必须由日本殖民当局负责，以期使学生达到对皇室、国家、个人、他人以及社会的正确认识。“国民道德的中心是培养忠孝观念，明确国体观念，知晓天皇、皇后两陛下、明治天皇及昭宪皇太后的隆恩盛德，尤其是关于当天皇陛下对朝鲜人的深厚恩泽必须逐年教导学生……”^④ 最终达到国体兴隆、培养成出“皇国臣民”的目的。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企图通过控制教科书达到禁锢人们

¹ [韩]尹丝淳：《儒教对韩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载刘厚琴主编《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504页。

^④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道路》，第29页。

^④ 《韩国近代教育史》，转引自袁本涛《韩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研究报告》，2001年第34页。

思想的目的，同时还对传播民族思想和民族独立情绪的韩国民间人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和传播自由思想与基督教伦理的教会学校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

在教育制度上，日本方面也实行矮化、歧视政策，如韩国的普通学校学制为4年、高等普通学校为4年、实业学校2~3年、专门学校3~4年，并重点发展普通学校。相应的这一制度在日本国内则为小学6年、中学5年、专门学校4年、大学6年。¹ 日本殖民当局还非常重视语言文化的植入。日本殖民时期，除朝鲜语和汉文科外，其他所有学科的教科书、教学用语甚至校内生活的日常用语都是日语。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规则的规定，正确和流利使用“国语”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国语即是日语，整个小学期间，日语占有近40%的教学时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文化侵略，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有切身的体会，他曾指出：“本人于1927年出生在巨济岛外浦里公鸡岛村。这样，我的幼年只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在我国深深扎根的时候度过的。我能模模糊糊地领会我所处的时代始于进入小学之后。那时，在家与妈妈、爸爸使用的语言到学校就不能再用，于是开始感觉到我们的语言在叫做‘日语’的新语言的威力面前无能为力。从而我也开始对社会‘感知’起来了，开始觉悟到，我像侍奉主人一样侍奉日本人的可怜处境。”^④

日本在韩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强行推行日本文化的社会化，摧毁了韩国政治文化的自然发展，割裂了韩国政治文化的传承。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深深影响到韩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日帝时代遗留下的空白，朝鲜的文化传统经历了一段令人扼腕的中断，直到解放之后，尚能感到受害的严重后果。”^④可以说，日本在殖民统治期间，以强迫的方式把大量的现代事物带到了朝鲜（当然也是强加给朝鲜），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朝鲜现代化的进程，但殖民统治对朝鲜人民民族自尊心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强制现代化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对现代事物的抗拒。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对韩国造成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日本的官僚统治带有浓厚

的军事化色彩，它能利用高效率的和比较清廉的官僚机器来强行推进改革。如被誉为韩国“奇迹之父”的朴正熙总统就有浓厚的日本军队背景，朴正熙政权的高级官员们也大都具有日本背景。他在日本的士官生涯使得日本军人的职业素质、日本社会的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他的政务管理、政治决策和政治风格。“如果说李承晚这一代在日治时期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脑子里记忆的是李朝管理国家的经验的话，那么，朴正熙这些在日治时期长大的人脑子里装的是日本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¼ 直至今日，韩国的政治文化也不能说没有日本文化的因子。

总之，日本文化对韩国政治文化影响较大，日本在韩国推行政治社会化可以说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二是日本文化的直接移植。如此一来，日本文化在韩政治社会化的形式与内容，一方面造成其影响大多停留在上层及教育方面，而广大的普通民众由于动员不充分，反应较为冷漠，甚至引起了广大民众的逆反心理，以至于有些属于先进的文化也被一并排斥；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当局对韩国本土文化的傲慢与偏见，采取了强行移植的办法，使得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遭到压制、重创，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三 “军队”与“经援”护卫下的美国文化

美国对韩国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影响亦不可小

¹ 孙启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34~36页。

^④ 〔韩〕金泳三：《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郑仁甲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7页。

^④ 〔韩〕林嬉燮：《韩国文化的变化与展望》，载韩国社会学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周四川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87页。

^¼ 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文津出版社，1993，第79页。

颀。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至此日本对朝鲜长达 36 年的殖民统治宣告彻底结束,朝鲜迎来了民族解放,但旋即进入“美军占领期”。无论是从战后的“美军占领期”,还是到其后的“开发援助”、“韩美同盟”等阶段,美国文化都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美国对韩国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与美国军事结盟,韩国成为美国制度输出的试验田。“美国政治文化的扩张是一种强行向其他国家推行自己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美国实现其外交战略的目的考虑,作为‘第四种武器’,对美国来说它也许是其他外交方式难以替代的有效手段。”¹ 美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韩国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价值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与重塑,对韩国民主进程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因此,尽快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构建新的国家体系,推行美国式民主成为战后相当长一时期内韩国政治社会化的主要任务。

美国政治文化的精髓是“民主主义”。因此,美国文化在韩国的社会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式民主文化的社会化上。美国文化的影响又主要体现在占领期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美援期”。由于日本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政策,不少人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因此,在占领期内,美国注重对韩国教育进行改造。“光复后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奴化教育制度,消除其影响;树立民主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积极扫除文盲,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普遍提高国民素质。”^④ 美国驻韩军政府把美国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体制搬到韩国来,对教学内容进行革新,向学生灌输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

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民主主义理念,通过“弘益人间”^(四)得以实现。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1945年,韩国教育审议会^{1/4}将培育具有爱国精神的国民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有关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各种事宜是教育审议会做出的各项决议中

至为关键的。负责教育理念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主张把“弘益人间”作为教育理念。该教育理念的设立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要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遗毒、建设新国家;二是“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基督教、儒教和佛教的一些教义相通,包含着人类共同繁荣的理想,符合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该理念强调培育在民主市民意识的基础上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以及着力培养所有人都具有健全的人格、自主的生活能力以及民主市民所必需的素质,让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实现民主国家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基于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培养人格完善,并具有深切爱国精神的民主国家的国民。”^{1/2} 在这个理念中,爱国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个思想对韩国的“教育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在 1949 年颁布的《教育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延续至今。

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是美国输出政治文化的重要渠道。美国通过训练使韩国军队“美国化”,并通过军队的“美国化”影响韩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

¹ 王晓德、张晓芒:《历史与现实: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第 179 页。

^④ 池青山:《韩国教育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第 1 页。

^(四) “弘益人间”出自于古朝鲜的建国神话——“檀君神话”,是韩国开国神话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主旨是令天下苍生共同受益的意思。

^{1/4} 美军于 1945 年 9 月 9 日接管朝鲜总督府(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机构),从 9 月 11 日起在半岛南半部正式实行军政。军政厅学务局于同年 11 月 23 日聘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百多名权威人士组成朝鲜教育审议会。该审议会下设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教科书等 10 个专门委员会,从宏观角度对教育进行改革。审议会先后开过 105 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和 20 次全体会议,于 1946 年 3 月 7 日完成其历史使命。

^{1/2} 韩国教育课程、教科书研究会:《韩国教科教育之变迁》,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0 第 81 页。

以此来铸造与韩国传统政治文化迥异的美国政治文化。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在他看来,“援助能够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并避免许多国家崩溃或融入共产主义集团的一种手段”。¹美国政治文化在韩的社会化,起初主要通过军队作为载体而达到目的。战后,美国一直致力于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的亲西方的政权,但在意识到无法通过谈判或战争达到目的后,美国开始扶植李承晚政权,建立大韩民国,通过军事以及经济援助,促使韩国当局按照自己的意图不断变换,并成功地把韩国打造成在东北亚与苏联阵营抗衡的堡垒。美国对韩国军队的同化是前者以自己为模版对后者进行全面改造的一个侧面,美国文化一定程度上在韩国军队身上得到最为明显的体现。“韩国军队是韩国社会中最坚定的‘亲美集团’,美国对韩国军队施加影响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军事援助装备韩国军队;通过军事顾问团和建立美国式的军校向韩国人灌输美国式的作战方针和文化理念;通过朝鲜战争中国军队与35万人的美国军队共同作战,面对面地施加影响;通过把大批韩国军官派往美国,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完全美国式的军事训练。由美国装备和训练出来的韩国军队,各派别之间的差异越来越被美国所带来的共性所淹没,韩国军队逐步演变成成为社会中最美国化、最现代化的群体。”^④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从美军占领期至今,韩国军队在该国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大韩民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政治史上,竟有半数为军人掌权。从朴正熙、全斗焕,到卢泰愚等总统皆为军人出身就是一个明证。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已成为过往,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经济援助也是美国输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经济援助,达到政治目的,一直是美国对韩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对韩施加政治压力,进而使韩国朝着自己希望的政治模式前进,推动美国政治文化在韩的社会化。

此外,美国文化除了对军人施加影响外,还特

别重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韩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规模非常庞大,一直占据各国留美学生的前列。2007年韩国留美学生人数突破10万人,居全球各国留美学生首位。这些留学人员回国占据高等教育或其他重要位置,成为传播美国政治文化的载体。”^(四)青年人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的熏陶,更加认同美国的模式,与韩国的政治传统出现了明显的决裂。他们接受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观念,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独裁统治,并通过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来表达政治愿望。

因此,无论是韩国宪法的制定、民主政治框架的引进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体现出浓厚的美国政治文化色彩。如就韩国宪法看,韩国自1948年颁布第一部宪法以来一直实行民主共和制,其后到现在为止韩国宪法共修改过9次,但每次修改都未放弃这一原则。连最具权威主义性质的《维新宪法》(1972年)也规定:韩国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基本的立宪国家;按照国民主权主义,保障国民的参政权;按照三权分立主义,实行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使之分属于政府、国会与法院;按照法治主义,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大众民主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甚至1919年4月11日颁布的《大韩民国临时宪章》也规定大韩民国实行民主共和制。^{1/4}美国文化在韩的社会化过程,以政治、经济、军事架构为保证,以价值观的输出与文化认同为目的,最终在韩落地生根。

¹ Roger C. Riddell *Foreign Aid Reconsider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2

^④ 董向荣:《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发展的影响(1945~196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21页。

^(四) 陶文昭:《韩国民主的美国因素》,《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6期,第67~71页。

^{1/4} 许吉:《朝鲜韩国政治文化》,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第266页。

结语：启示与思考

1. 政治文化既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从中、日、美三国文化对韩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韩国社会在保留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或主动或被动地改造与被改造，这也造就了今天韩国所独有的政治文化。一种政治文化，主动地吸取别国的文化，对改良、充实本国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当迫于强力被改造的时候，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冲突和动荡。从韩国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对美日文化的不同际遇可以看出这种区别。在一项题为《美国在海外的内部防卫政策》（U. 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的文件中指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和制度是极具可塑性的。”进而解释说：“各社会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自我调整，以适应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必要的基础正在被建立起来。这将不可避免地破坏那种孤立的乡村生活所塑造出来的传统和习惯。”¹ 因此，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独特的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政治文化，将对一国政治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今天韩国文化，乃至韩国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形成历程不无关系。

2. 政治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就是社会组织和群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凭借一定的传播手段向社会个体传播一定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教导政治生活。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否成功，政治社会化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把一个社会的成员培养成合格的政治角色。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程表明，一方面政治组织通过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将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价值判断、政治理念、基本技能等传授给公众；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组织活动及其对政治运行的干预传播强化着该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从而使个人了解政治生活，并对

自己的政治角色具有清醒的认识。这些无论是从儒家文化在韩国的落地生根，还是美、日文化在韩国的植入，乃至最终完成对韩国社会的改造，都可以发现政治社会化在韩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教育功能。

3. 政治社会化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

韩国社会是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虽然所有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都遇到过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的问题，但韩国社会所遭遇的变动可谓更多。从“甲午更张”到“韩美同盟”，韩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可以说一直命运多舛。既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与不稳定是难免的，那么在这个阶段，政治社会化的成功与否，对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到美国式民主文化在韩国的社会化历程分析中可以发现，一种政治文化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代表了该时期的先进文化，还取决于能否将该文化社会化；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强势，而更取决于该文化是是否能够与本土文化契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对韩国的社会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甚至成为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4. 正确利用政治社会化的政治构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紧密联系，甚至在短时期内一定的政治结构会主导着政治文化的发展。韩国政治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文化的变迁表现出极大的不同步性。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构建可以说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先导功能上，儒家文化的引进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建立关系紧密。而美、日文化对韩国政治社会的改造，更多地体现为制度先行，以政治结构影响、塑造政治文化，进而推动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作为后发国家，在现

¹ Memorandum, InterDepartmental Seminar on Counterinsurgency, August 1962, NSF, box 338, "NSAM 182 Counterinsurgency", JFKL 转引自 [美] 雷迅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 269~270 页。

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主动吸收别国优秀的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本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¹因此,如何正确、充分利用政治社会化的政治构建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顺利走向现代化意义重大。

概而言之,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文化,以便说明和论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用以维系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进而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性。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言,“虽然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都能获得合法性,但民主政治也许比多数其他体系更有此需要”。^④政治权力一旦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就会获得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能使统治者以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对社会的控制。“与用强制手段

相比,用权威手段进行统治要经济得多。”^(四)政治社会化便正是执行着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职能,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它通过对政治文化的维持、改变或创造来实现这一功能。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目前看来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韩国民主化改革无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研究韩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能为我们厘清韩国民主政治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还能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¹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第1~2页(译序)。

^④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7页。

^(四)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78页。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Korea

Abstrac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the communication, maintenance and change of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of a state largely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upling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while external condi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reasons, Korea experienced the dis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e sense of worth and the attitude training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many times.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Korea greatly influences by the external factors, especially powerfully influenced by China, Japan and USA. Studying the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three state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Korea will provide beneficial example and inspiration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Key words Korean Politics,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uthors Liu Dongjia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Field research: moder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or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